

民初连横东北之行和诗文创作研究

张羽^{1 2} 侯京京^{1 3}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3.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乙未割台后,连横发表《满洲最近外交史》《台南新报满洲之风云》等多篇政论文章关注东北问题。民国初年,连横赴东北短期工作,参与《新吉林报》《边声》的编辑工作,写下有关国际时局、东北地景、民族英雄、服饰文化的诸多诗文,后收入《大陆游记》和《大陆诗草》。这些诗文具具有现代思想,不拘泥于平仄押韵,体现了“慷慨激昂”与“温柔细腻”两种文风,字里行间充满了中华民族观念。在东北的所见所闻,促使连横怀疑日本宣扬“亚洲门罗主义”的真实动机。此行结束后,连横选择复籍,并开始撰写《台湾通史》。连横诗文创作生动地再现了日据时期台湾文人对东北命运的关注,为今人重看日据台湾和东北之紧密文化关联留下诸多线索。

关键词:连横;中华民族叙事;历史叙事;文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9)05-089-11

DOI:10.14157/j.cnki.twrq.2019.05.009

一、前 言

连横(1878—1936),初名允斌,字雅堂(棠),号剑花,后改名横,生于台湾县(今台南市),祖籍漳州龙溪县(今龙海市),是台湾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曾辗转两岸多地担任报社记者、主笔长达二十余年,被视为台湾新旧文学过渡阶段最重要的文化人之一。1913年6月30日至1914年春,连横赴东北办报,原有观念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开始规避日本所宣扬的“亚洲门罗主义”。离开东北后,连横选择入籍中华民国,其所思所想对解读台湾文人在重要时刻的身份认同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连横诗文的重要论著较早有朱学琼《剑花诗研究》^[1],将连横所著《剑花室诗集》视为“台湾旧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且“与宗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爱国惜族”的家国情怀评价了该诗集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性。新世纪初黄美玲的《连雅堂文学研究》^[2]分析了连横诗社在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文学价值,客观评价了其在台湾文坛上的贡献和成就。此外,林文月撰写的《青山青史——连雅堂传》^[3]记述了连横生平事迹,附文展示其重要诗文作品、日记、评论,生动呈现传主形象。另有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4]梳理了连横生平。近年亦出现不少研究连横的学术论文,如江宝钗《日治时期台湾传统文人对世务之肆应——以连横的汉学传播事业为观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历史文化认同融合研究”(16JJDGAT002)

作者简介:张羽,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文教平台执行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侯京京,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察核心》^[5]一文分析连横所从事的汉学传播事业,如出任报刊主笔、创立诗社、开办书局、设立汉学研究会等,将其视为“反日本化”。林元辉《以连横为例析论集体记忆的形成、变迁与意义》^[6]从集体记忆角度来分析连横作为“民族诗人”“抗日诗人”“爱国史家”“富有民族大义的学者”等的形成脉络。在日据台湾五十余年间,赴大陆学习与工作者,连横绝非个案。因日本施行“抚与鞭”政策,一方面,以“内地延长主义”策略来拉拢台湾人,另一方面,施行“六三法”等恶法来限制台湾人的发展,因此,有不少台湾人选择前往东北学习和工作。一般认为,伪满洲国成立后才出现台湾人的移动热潮。事实上,早在民国初期,已然形成了台湾人赴东北发展的潮流,有一批台湾商人、官员、医生奔赴东北。许雪姬对此有较多重要论述,如《是勤王还是叛国——“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的一生及其认同》^[7]分析了台湾人谢介石官至伪满“外交总长”,成为吸引台湾人赴东北发展的“成功样板”;《在“满洲国”的台湾人高等官:以大同学院的毕业生为例》^[8]介绍了1932年后大同学院毕业的台湾人到伪满洲国的原因及经历,以及战后回台的遭遇。此外,许雪姬主编《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9]访谈了伪满时期的台湾医生、官吏、学生和家庭主妇。一些有伪满经历的台湾人年事已高,在返台定居后,受台湾时局影响一直对伪满经历讳莫如深,因此该访谈录具有抢救性质。

目前学界鲜少对连横远赴东北办报经历、思想转变和诗文创作进行研究和解读,本文拟以《鹭江报》(厦门)、《盛京时报》(沈阳)、《台湾日日新报》(台北)等第一手报刊资料,结合《大陆游记》《大陆诗草》诗文创作,及其同时代文人唱和作品等,梳理连横远赴东北的原因,解读连横与章太炎等人的精神交往与思想互动,分析其思想的重要转变,并对其诗文创作呈现出的“慷慨激昂”与“温柔细腻”两种文风进行分析。连横对东北的关注与思考,生动再现了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对东北命运的关注,为今人重看日据台湾和东北文化之关联留下诸多线索。

二、连横的东北之行及其行旅纪游考

为了更好地理解连横思想转变的根源,先简要回顾其青少年时期的经历。1895年,连横父亲猝然离世,时年18岁的连横服丧期间,手抄杜甫诗集解忧明志,同年“走番仔反”到福建,学业工作未能如意,隔年返回台南。^[10]1897年春,连横赴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俄文,未几,其母寄信催其返乡完婚。完婚后,曾与同乡友人结社“浪吟诗社”。1899年,连横开始进入报社工作,自此断断续续在报界工作二十余年。其赴东北前的报界经历如下:1899年,首任台南《台澎日报》汉文部主笔,该报后改组为《台南新报》,连横负责编辑汉诗和古文;1902年秋,赴福州参加乡试,同年任厦门《鹭江报》主笔,后返回台南;1905年春夏间,赴厦门创办《福建日日新闻》,^[11]南洋方面中国同盟会拟将其改组为机关报,但因报纸参与“反美拒约运动”,美国驻厦门领事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致使报纸被查封,连横等被惩治,而改组未果;^[12]同年10月,《福建日日新闻》被迫更名为《福建日报》继续出版,连横为避免迫害离职返台,入主《台南新报》汉文部;1908年,移家台中,入“台湾新闻社”汉文部;隔年,加入台湾重要诗社“栢社”;1912年赴大陆前夕,曾在《台湾日日新报》供职;^[13]1912年4月,经友人周寿卿引介,入华侨联合会,任报务,并筹备机关刊物《华侨杂志》。

探究连横东北之行的原因,笔者推测有四个:其一,在东北的台湾好友谢介石^[14]和王香禅^[15]的热情邀约,成为其赴东北的情感因素。谢介石化名谢恺,时任吉林法政学堂教习,兼吉林都督府政治顾问。^[16]其二,长春《新吉林报》^[17]的聘任是促使连横远赴东北的根本原因。连横一直对办报颇有兴趣,尽管屡屡受挫,但依然对以办报启发民智抱有期望。^[18]其三,连横听闻章太炎此时在东北任职,这是促使他北上的思想吸引力。1913年春,章太炎受委任赴长春参加“东三省筹边使署”建设,“曾粗疏计度为一书,请交国务院议决在案”,并进行“实地查验”,拟订《东省实业计划书》,^[19]但4月份却“托事南行”。^[20]在章太炎离开的两个月后,连横抵达东北。两人虽未谋面,但亦有精神互动,具体将在下文详细论述。其四,旅居上海时期,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二

次革命”山雨欲来。连横深感“当是时国内骚忧,如蝸如蟻,而余以新吉林报之聘,远游关外,以观其变”。^[21]为避开骚乱,决定离开争斗中心上海,奔赴东北。

连横大半年的东北行程与交游,有部分时段的行程难以推考。1912年,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同年连横展开了为期三年的大陆之旅。他先至日本神户,再转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游历。连横到上海时,吴少侯(吴子瑜)置酒招待,席上有谢介石夫妇、林子瑾、李黄海、高幸君等台湾同乡。^[22]当时连横未找到稳定的工作,谢介石在吉林法政学堂任教习,热衷于社会活动。^[23]分别未久,连横便接到了谢介石与王香禅的书信邀约。他自言“幼安将出关,约偕行,余以南中有事且缓,而幼安辄以书来,香禅亦谓吉林多佳山水,足供先生题咏也。余遂束装而至,以晤故人。”^[24]

1913年,他游历北京、张家口、望都、磁州、武昌、汉阳等地。6月30日,由上海出发,乘舟赴牛庄、营口,访王敬欣。^[25]7月1日早,赴奉天(今沈阳),写下了《辽东道上寄少云》《红柳词》。连横注意到被贬谪到东北的文人所发出的不平之声,“满洲这个地方,是关外之地,在古代,是谪官之所栖迟,征夫之所戍守,因此以其为背景而发为诗歌者,大都无聊不平之意。”^[26]路至大石桥,这里是“南满”铁路的干线,引发连横对日俄染指的东北铁路的关注:“(牛庄至大石桥)为南满铁路之干线,其南则往大连者也。此路为俄国所筑,以接西伯利亚。日俄之役,割让日本,以长春为界,南为南满,北为东清,亚欧联络之线也。而日本又于奉天别筑一路至安东线,渡鸭绿江而入朝鲜,以至釜山,自釜山乘船至门司,半日可达,而至台湾仅三日,缩地之术巧矣。故前者以台湾赴奉天,计程甚远,今则五六日可至,舟车之利大矣哉!”^[27]

经辽阳,抵沈阳,停留6天。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在此设盛京皇城,连横慨叹龙兴之地的“肇基之风”:“奉天为清室陪都,觉罗氏之故宫在焉,宫中富藏珍宝,价值数千万元。余由都督府之介,始得入内详览,宫制稍小,犹见肇基之风。”^[28]在沈阳清故宫内,连横得见藏列的大量奇珍异宝,在赞叹其“举中国四千年来之精华而最之”的同时,也对曾有“八旗之勇”的满族的沦落衰势而深感遗憾:“满人以弓矢得天下,历代帝王皆习骑射,八旗之勇,致果有功,故能并服禹域。中叶以来,其气馁矣!盘游宴乐,竞张歌舞,而龙虎将军之威武遂不复见;鱼烂而亡,固其所也。”^[29]连横为查阅相关史料以供撰写《台湾通史》之用,于宫内文溯阁勾留6天,曾浏览四库全书中之平定台湾纪略,以供史料,“见有四库全书之《平定台湾方略》,凡数百卷,为福康安平定林爽文者,附图数十,乃浏览其概,以供史料。顾此为官书,未可尽信,而又不无少补也。”^[30]之后,又游福陵(清太宗陵)、“奉天陈列馆”、奉天围场、西关外之小河沿等地。

随后,连横登车赴长春。长春是“吉林之商埠也。轮轂交驰,四通八达,南为南满,而北为东清;日俄势力分据之地也。东至省会,西控蒙古,关外之疆,此为枢要。”^[31]此期间,连横写下了《长春》《长春道上寄友人》。由吉长铁路入吉林,途径饮马河,因河水涨溢,铁路中断,徒步以济(写有《大风雨中渡饮马河》)。过河后,复乘车,经土门岭,至吉林,住在谢介石家里。

到谢家翌日,在谢介石的安排下,连横即与吉林文人松毓^[32]、杨怡山^[33]等见面。当晚杨怡山邀宴于第一楼。《新吉林报》聘请连横入社后,不久即因社论言论激进被禁。“先生乃与吉林时报社主日人儿玉多一别刊一报曰边声,以持公论。是时关内外之民报悉遭摧残,莫敢一言是非,而边声遂大为飞跃,远至滇、蜀。”^[34]“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压制言论,解散国民党及国会,连横对此备感愤怒,迅速撰文声讨于《边声》。^[35]

1914年春,连横离开吉林,写下七律《留别幼安、香禅》,其中有“客舍扶持如骨肉”诗句,但其离开东北的具体日期,未有详细记载。据推测,他可能在离开东北后,便向国民政府申请复籍。洪卜仁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到当年连横申请中国国籍的呈文及内务部的批文。呈文写道:“具呈人连雅堂,原籍福建龙溪县马崎社,现籍日本台湾台中厅台中街,现寓北京南柳巷晋江邑馆。为呈请事,兹依《中华民国国籍法》第十八条及施行规则第六条所规定,呈请许可复籍。”《愿书》写道:“愿回复中华民国国籍并遵守中华民国一切法律。”^[36]连横领取复籍执照日期为1914年2月

10日。此后,连横应聘为清史馆名誉协修,^[37]工作之余仍不忘查找台湾资料,为撰写《台湾通史》做资料储备,并上书言清史应“增拓殖志”,记华侨拓殖各地之情形。

1914年冬,连横返回台南,将126首诗汇集命名曰《大陆诗草》;再入《台南新报》,开始撰写《台湾通史》,长达三年时间。1918年秋,《台湾通史》完稿。^[38]在《台湾通史》中,“连横所揭的正统观非常刚性,当与所处的历史情境相关:藏在其对满/汉之间界限分明的坚持,其实就是对中国人/日本人之间界限应分明的坚持提醒。”^[39]

三、“壮士说剑”与“美女簪花”:连横诗文的东北书写

连横一生热心推广汉诗,曾加入浪吟诗社、南社、栎社和钟社,并积极参加瀛社等诗社活动。他在《大陆诗草·自序》中写道“久居东海,郁郁不乐,既病且殆,思欲远游大陆,以舒其抑塞愤懑之气。当是时,中华民国初建,悲歌慷慨之士云合雾起,而余亦戾止沪渎,与当世豪杰名士美人相晋接,抵掌谭天下事,纵笔为文,以讥当时得失,意气轩昂,不复有癯惫之态。”^[40]从叙述中可看到,连横赴大陆前,心情郁郁不乐,返归大陆后,渐转豪迈。这种心境转变还体现在《吉林重晤香禅》一诗中“万里投荒一剑雄,出门真觉气如龙。山河两岸留诗卷,风雨千秋付酒筒。塞草未霜迟客绿,园花半老对人红。莫嫌身世同萍梗,且向鸡林印爪鸿。”^[41]鸡林,即吉林。“气如龙”是指连横赴东北后,一改往日的郁闷之气,顿时生龙活虎。诗中的“塞草”“萍梗”,比喻行踪如浮萍断梗一样,漂泊不定。诗人告诫自己,不要悲伤身世命运,自勉在吉林有所建树。1912年赴大陆前,连横因接连遭遇爱妻生病、挚友亡故的打击,自己也生了一场大病,加上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狭小逼仄的生存空间,心情郁闷低落,其诗文中常出现“愁”“哭”“萍梗”“恨”“怨”等词。^[42]赴大陆后,无论诗风还是心境都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早在1905年有人评价连横的诗作“雅堂固工诗,著有剑花诗集,忽而壮士说剑,慷慨激昂,忽而美女簪花,温柔细腻。”^[43]“壮士说剑,慷慨激昂”的豪放与“美女簪花,温柔细腻”的婉约成为两种对照的文风呈现在东北书写中。览历史古迹时伤古怀时,道山川美好时欣喜热烈;评国家时事时慨然臧否,苦心孤诣,与友人惜别时,又情深义重,柔肠百结。诗风与心情相互映照,从中也可以看出连横的思想动态与情感世界。

(一)“酿成东亚祸,一幅满洲图”——对于“联俄”策略的批判

乙未割台后,连横意识到“满洲”未来命运岌岌可危,开始积极学习日语和俄语,并发表多篇政论文章,评论东北在日俄割据后的时局与未来命运,在诗文中也多次哀叹东北的命运多舛,痛惜其与台湾的同病相怜。1898年11月,近卫笃磨在会见康有为等人之际,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了“亚洲的门罗主义”,亦即所谓“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盖不外乎此意。在东洋实现亚洲门罗主义的义务实际上就落到了贵我两国人的肩上。今日之时局虽然不容实施此事,而最终目的则必须在此。”^[44]日本随即展开“亚洲门罗主义”的舆论宣传。连横在此宣传下倾向于“批俄而友日”,他在《满洲最近外交史》写道“日本之与支那,兄弟之国也。利害同之,存亡共之。”^[45]周围报人也有很多人认为在日本帮助下可以抵制俄人入侵东北,并且在黄白人种之战中胜出。^[46]

1901年9月27日,连横听闻李鸿章病卒,写下了《吊李鸿章》四首,其中一首写道“联俄主义亦良谟,揖盗重门半着输。我欲殉公无别物,袖中一幅满洲图。”他讽刺李鸿章的“联俄主义”,认为“李一生固宠在此、破坏亦在此”。《咏史·李鸿章》写道“款日和非拙,联俄策未迂。酿成东亚祸,一幅满洲图。”《咏史》组诗共吟咏了130位古今中外人物,在写中国历史人物时,多从民族主义立场评价。李鸿章作为晚清名臣,是洋务运动领袖之一,也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割让国土的不平等条约,其功过是非已记入史册留待后人评说。而作为同时代的人,连横凭借独到的史学眼光和台

湾遗民亲身经历,批判了李鸿章以领土换和平的失策,认为此举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忧虑于台湾如此,“满洲”也将步其后尘。

1905年,连横时隔三年后再度赴厦门,与同乡友人蔡佩香^[47]等创办《福建日日新闻》,然而因抨击美帝,被迫离职归台。在《携眷归乡留别厦中诸友》中,连横认为报纸可以传播新观念、新思想,能挽回国势。自主笔《鹭江报》至此已过三年,中国政治、社会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报界也随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评论报道热潮,而这些言论确实起到了惊世、醒世的作用。

到达大陆之后,连横更多地了解到俄国的侵略野心。在赴西北路上,他写道“俄人为鬼蜮。虎视眈眈,狡谋肆蚕食。”在东北,他凭吊日俄之战迹,“有感于东亚兴亡之局”,写下了“廿纪风云新世界,一时争战莽山河。冰消辽水朝传箭,月落开原夜枕戈。”^[48]连横实地探访东北时,发现“满铁”在东北势力之大,“大连为日本租界,北至长春,则势力之范围也。日侨居此者近十万人,驻兵要处,以警卫铁路有事则任攻守。铁路属界之内,权如租界,设警务署以理之。又有领事以办外交,而南满铁道会社实当经营之任……今且扩及东蒙,吉长铁路亦归掌握,是长春者固日本经营满洲之中心,而操亚欧陆运之纽也。铁路属界,新辟街衢,规模宏大,商旅往来,多集于此。中国军警固不得越界侵权也”。^[49]这促使他对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也促使他离开东北后,选择恢复国籍。20世纪初期,“亚洲门罗主义”论调刚刚兴起,同多数国内革命者一样,连横抱着“同种之谊”、共御异族的想法,也颇为支持,如《台南新报满洲之风云》一文就曾说道“吾以为今日之满洲问题,垂死之清廷不敢出而容喙矣。而能据公理以争还主权者,惟关系之列国耳。曩俄人欲夺君士但丁,英法出而抵拒,共歼俄师于黑海,东欧之平和始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之满洲问题,日英两同盟国固当肩其巨任也。”^[50]但他同样明白自强自立的重要性。1902年,连横赴福州应当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经济特科乡试不第,后留滞厦门主《鹭江报》笔政,曾到访鼓浪屿,并与林鹤年、林景商父子以及施景崧常相过从。当时的连横已开始公开发表国是主张,纵谈人权新说,倡导振兴女学。从《重过怡园晤林景商》中“心期吾党振民权”“振兴亚局仗群材”两句,依稀可以看出他当时兼具拥护革命党派的政治立场和认同日本“兴亚论”的思想。等到连横真正来到东北,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日本在实际占领地区实施的管控,他对“亚洲门罗主义”有所动摇和规避,转而将关注重心放在民国建立后的中华民族振兴上。他写道“是满人虽据有诸夏,而国粹早已消灭,族安得而不弱哉?民国既建,汉满平等……夫灭国者必灭其史。”^[51]文兴、史兴是首要,然后则要民兴、制兴。连横密切关注国会选举,发表大量文章抨击袁世凯当局破坏约法,窃取国民艰难缔造之国家,并认为人民与国家密不可分,“矧在共和之邦,以民为主,是民德之进退,尤有系于国家”。^[52]中华民国的建立,让连横精神大振,此后诸多诗文将为国效力作为主题。

(二)“提剑来大陆”“投笔愧班超”——为国效力的凌云志向

台湾被割让后,连横对“满洲”问题颇为关切,“满洲”成为他所撰文章的高频词。1902年,连横任厦门《鹭江报》主笔,年轻气盛,对外国入侵中国颇感忧心,对清廷割让台湾极为不满,因此对郑成功、班超等人颇为敬仰。《鹭江秋感》有云“延平霸业久销亡,两岛难将一苇航。西北妖氛传露布,东南大局失云章。满城风雨思乡泪,匝地千戈吊国殇。入夜笳声吹到枕,梦魂无定赋归乡。”此时厦门和台湾两岛难以通航,西北有俄国虎视眈眈,东南台湾早已失守割让,如今遍地是悲凉之声、悲愤之情,当年郑成功的霸气何时才能重现?诗人忧国忧民,有返回台湾的打算,但如今的台湾又被日本殖民,一股失根的漂泊之情油然而生。1911年,连横在《铁砧山记》一文中,对郑成功亦有所怀念“铁砧山在大甲溪西。高不过百仞。而山势崔巍。饶有英伟之气。山中有井。泉甘冽。大旱不涸。人称国姓井。每清明前。有群鹰自凤山来。聚哭极哀。非至疲弊不止。……指为延平郡王成功驻师之地。……秋风故国。过大甲溪者能无盛衰兴亡之感。”^[53]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在晚清政府统治下,中国政局衰败混乱。遥想当年延平霸业,再观今日殖民之景,抱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连横自然而然生发出吊古伤今、昨是今非之感。

《宿张家口,出大境门,至阴山之麓,怅然而返》作于1913年3月,此时连横已在祖国大陆游历近一年,诗中写道“壮哉此雄关,勿为丸泥塞。我志欲请纓,慷慨事金革。提剑出国门,驱车度沙砾。眼底隘居庸,浩气吞戎狄。因思古人豪,铭功耀玄幕。班超亦书生,手平卅六国。”此行连横本欲作塞外之游,因库伦以西路途险恶而作罢,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豪情壮志。朱学琼指出“是时蒙古未靖,活佛反侧,俄人虎视日亟。作者忧俄人终为我边患,故有请纓之志。”^[54]“提剑出国门,驱车度沙砾”一句表达了诗人守护国土边疆的志向雄心,“班超亦书生,手平卅六国”则以班超自比,追随先人足迹,继续书生报国志。班超是连横诗文所钟爱的人物,吉林将归时所作《秋雪》其四中亦写有“乾坤犹瀕洞,投笔愧班超”,呼应上一首。诗人在经历两次报纸被禁的遭遇后,为在东北并没有创出应有的功业而惭愧。

另一组出关之作《出关四首》最能体现连横在清朝刚刚灭亡之时进入“龙兴之地”的所思所感。第一首诗中,连横自言是沦落的江南客抵达塞北,山海历尽沧桑,云烟飘渺。最后一句“弃繻酬壮志,今日有终童”典出“终军弃繻”。《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终军》记载,汉代终军十八岁召为博士弟子,由济南入潼关时,关吏嘱咐他保留过关之繻以备返程通关。终军弃繻而去,誓言不得功名不复回。此处连横自喻终军,表达了出关赴东北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第二首诗中,有“辽沈销王气,扶余吊霸才”,诗人看到清帝国的发源地王气已消沉,在当年东北地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扶余国的遗址凭吊古代雄霸四方的英雄愈发感慨。第四首又说“黄龙今痛饮,朱鸟命如何!对月怀前事,临风发浩歌”。“黄龙”即黄龙府,辖地在今吉林一带,为金人的腹地。“黄龙痛饮”语出《宋史·岳飞传》:“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清朝犹如朱雀命格,坎坷波折,但民国建立,命运翻转,诗人借此表达多年夙愿已成的欣喜之情。

章太炎是连横最为仰慕向往和私淑效法之文人。历史人物熊成基成为章太炎和连横唱和的对象。在东北,连横曾写下“千金谩学屠龙技,两臂空弯射虎弓。生就奇才天亦妒,死能杀贼鬼犹雄。血痕浪籍土花碧,泪雨空蒙塞草红。九世之仇今已报,九京含笑陋沙虫。”连横自提诗注云:“安庆之役,徐锡麟既死,戊申秋,熊成基又谋起事,不成,走日本,既闻载涛归自俄,要之满洲里,将刺之,事败被捕,戮于巴尔虎门外。余至此地,以诗吊之。嗟乎!国魂不死,刺客犹生。塞草长红,墓花萎碧。千古正气之存,唯此成仁就义之士也而已!”^[55]早在1913年2月23日,章太炎曾作《熊成基哀辞》“以彰先烈而斥凶人”。辞谓“独念谗人高张,久未梟除,其所以贼君者,不以临时对垒,顾诬为刺客以媚贵宠,而又饫以珍膳,饁以甘言,禁锢告变之人以自解说,使死者无怨声,而亲藩得以快意,斯可谓宗社党之造端也。”同月,致电北京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希望能够严惩元凶,并为熊成基捐资造像,以昭义烈。^[56]章太炎在连横之前曾在东北任职,对东北风物相对熟悉,连横以同吊熊成基来和章太炎进行精神对话。如若向前回溯,二人渊源亦颇深。据孙风华考证,章太炎、连横不仅都是新闻报刊业的长期工作者,而且两人曾经有过两次因为报纸而结缘的经历。第一次是1899年,章太炎避难台北并受聘于《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部。“章氏在台任职期间,因多数日人学者能了解中文,且报社有中文部之设置,故不时应和酬唱。据曾任台湾日日新报主笔的魏清德说‘章氏在台湾交的日籍朋友有馆森鸿(袖海),台籍友人李越涛、连横等。’”^[57]第二次是章太炎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以后,连横出任素有“《苏报》第二”的上海《国民日报》副刊编辑,以这种特殊方式将两人的“国粹”精神勾连在一起。^[58]连横一直对章太炎“心怀私淑”,他曾写道“太炎先生当代大儒;少读其文,心怀私淑……曩游燕京,曾谒先生与旅邸。”^[59]受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姓”^[60]的影响,连横常“以文字鼓动闽中社会”,曾翻印了上海寄来的抵制美货传单,广为散发。^[61]从东北回北京后,连横还特地去看被袁世凯软禁的章太炎“时袁氏专国……幽诸龙树寺中,后移钱粮胡同。不佞每往请益,先生据案高谈,如瓶泻水,滔滔不绝。”^[62]临走时,章太炎赠诗一首给连横,云“蓑墙葺屋小于巢,胡地平居渐二毛。松柏岂容生部娄,年年重九不登高”,自嘲被囚蜗居于此,蹉跎岁月,两鬓已渐渐斑白。但即使这样,类族辨物,善恶不能共处一处,自己也终不

会向袁当局妥协。从连横的回应“呜呼! 中原俶扰,大道晦冥”中即可以看出他与章太炎的同感同忧。

(三) “平生不作离愁语,今日分襟亦惘然”——乡愁别绪的缱绻柔肠

连横东北之行,诗文中多次以“柳”为主体意象,来描写离愁别绪。事实上,“柳”的意象在《大陆诗草》中共出现了19次,其文学寓意也表现出多义性和善变性,如“春堤杨柳绿毵毵,二月征衣浣尚蓝”中的江南情致,“杏花春雨江南梦,衰柳寒笳塞北诗”中的塞北风光,“我亦偷闲来试茗,败荷残柳不胜秋”中的萧杀秋愁,“到此真堪遂壮游,春风杨柳满关头”中的蓬勃春色,“武昌城角垂垂柳,管领东风春八九”中的名士譬喻,“柳花风有何冤孽,狼藉东风化作萍”中的生命消逝象征,“官柳未黄人已去,夕阳无赖象坊桥”中的历史沧桑、物是人非之感,以及“凄绝楚宫风雨夜,萧萧衰柳尚含颦”中的岁月易逝、人生难再的时间喻义,等等。但是在众多含义中,连横使用最富深情的意象表达,唯属离别思绪这一种。

如在赴沈阳的路上,诗人写下了《辽东道上寄少云》:“关门杨柳马前红,万里音书寄塞鸿。莫向闺中惊晓梦,征人今日渡辽东。”这首诗书写了“诗人的游踪见闻和身旁琐事”。^[63]“柳”与“留”谐音,柳枝飘扬,如柔肠百结。古时候人们多喜爱在故园家乡植柳,故“柳”成了游子与家乡、亲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连横远赴大陆,家中留下妻子一人照看4个孩子,他内心自然十分内疚与牵挂。1913年“八月一日子时,先生次女春台殇于台中”,“先生母刘氏及夫人以是驰书促先生归台焉。”^[64]他在另一首《朔风》中极写这种思家之情:“朔风起天末,寒气迫深秋。看菊仍多泪,攀兰亦有愁。孤灯儿女梦,一剑塞垣楼。莫作征人怨,双鱼到十洲。”在越走离家乡越远的北上途中,他看到沿途柳树,对妻子的思念油然而生。“莫向闺中惊晓梦”一句颇有杜少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想象意境。

在另一首《红柳词》,诗人更宣泄了离人泪:“胭脂塞上夕阳殷,马后桃花未忍攀。绾尽征人离别恨,一时红泪满关山。”诗中歌咏的红柳,亦称怪柳,耐碱抗旱,适于造防风林,东北多地均有分布。“伤心人看红柳若红泪,以‘红泪’比‘红柳’,可谓既拟其形,复拟其情。”^[65]作者自注道:“关外有红柳,传谓之怪。柔条万缕,如泣如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66]咏物寄情,游子思乡,红柳泣血,作者用“胭脂”“夕阳”“桃红”“红柳”大红之色,却写尽游子哀思。

1914年春,连横自吉林离开,临别之际写下《留别幼安、香禅》一诗:“平生不作离愁语,今日分襟亦惘然。客舍扶持如骨肉,人间聚散总因缘。塞云漠漠迟春色,海月娟娟忆去年。宾雁未归征马健,一箫一剑且流连。”诗歌写出了与谢介石、王香禅的“私情厚挚,苦相聚短暂,临别依依”。^[67]

除了与谢、王的友情,连横在东北还结识了报业中的一干文友。《如此江山(将去吉林,杨怡山嘱题写真册子,倚此志别)》,是诗人对杨怡山的临别赠言:“青山一发怜憔悴,伤春赋诗何处?离恨天中,浇愁海上,多少英雄儿女。年华如许,便把尽沧桑,画图收取。蜨梦鹃魂,相逢莫作凄凉语。多君激昂慷慨,只一箫一剑,自来自去。走马风流,屠龙身手,莫怨天涯迟暮。征骖且住,为君且高歌,为君起舞,为问他年鬓丝如旧否?”诗人感叹时光流逝,多少中华仁人志士为祖国奋斗贡献了青春,甚至生命,而你我也同在此行列中。

在《大陆诗草》结集后,有多位台湾友人为连横题诗,其中李逸涛评价连横诗歌为“大块文章归史笔,小庐风雨恼诗囚。无端复唱江东去,绝响铜琶弄未休”,^[68]说其大陆诗作既有“大江东去”的高亢文辞,亦有“小庐风雨”的凄婉诗情。离开上海远赴东北时,连横写下了《出关别曼君》的依依惜别诗作,但他同时也说过“夫满洲为关外之地,谪宦之所栖迟,征夫之所戍守,其发为诗歌者,大都无聊不平之意,而余以文弱书生,独提三寸之笔,以游于万里之外,走马寻诗,射雕饮酒,亦足豪矣”。^[69]由此可见,从赴东北到离东北,连横在东北创作的诗文与政论,自始至终既贯穿着豪放之气,亦流淌着缱绻柔思。这不仅说明连横延续发扬了自己一贯的诗风,两种感情的纠结缠绕更是连横复杂内心世界的表征。

(四)“惘惘出关成底事,半为吊古半寻诗”——对东北悠远历史的探访

连横在《长春道上寄友人》一诗中写道“少年棘矢桑弧志,倦矣珠盘玉敦时。惘惘出关成底事,半为吊古半寻诗。”诗中所说的“棘矢桑弧”是勉励人应有大志之辞。年轻的时候热血轻狂,感觉男儿志在四方,如今经历了纷乱人事和世道,心中怅然若失。诗人后面自揭出关目的是“半为吊古半寻诗”,可以看出连横想要暂时摆脱世俗烦恼、重新沉淀自我,其东北书写中也确实多有考史、咏古之作。

在诗文中,连横多次书写沈阳清故宫。如《游清故宫》中说“松杏山前百战功,曼殊宫阙郁云中。等闲落尽竿头雪,付与诗人吊朔风。”松锦大战是清朝开国史上的里程碑战役,乾隆帝说其“式廓皇图,永定帝业”。曼殊,“满洲”别称。连横游览时留意到有满族图腾的竿木,诗后特别注明“宫庭南隅树一长竿,闻为祭神之用”。诗人感慨,曾经的丰功伟业在历史长河中终会烟消云散,有清一朝历史如今也只能成为供人凭吊歌咏的对象了。连横亦写下《清宫观所藏历代宝器》,诗云“五云宫阙郁嵯峨,中有奇光透碧霄。禹鼎汤盘何足贵,素尊斑驳认唐尧”,并在《大陆游记》中详细介绍了里面收藏的唐尧之器、商器、周器、印玺、刀剑、衣裳饰品、书画、磁器等宝物,评价清故宫“宫中收藏之物,虽穷十日亦不能尽。……盖此非一时之物,举中国四千年来之精华而最之;非特中国之文明,且足以代表东洋之文明”,^[70]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自豪之情。

进入吉林时,连横写下了《大风雨中渡饮马河》:“短衣长剑出关遥,万里征人唱渡辽。漠漠山河秋瑟瑟,凄凄风雨马萧萧。歌翻敕勒笳声健,杯酌葡萄酒力骄。今夕松花江畔路,有人携手慰无聊。”饮马河,松花江支流之一,清高宗东巡吉林时,饮马于此,故称之。诗人正巧遭遇风雨天气,河水漫涨,只能徒步前进。诗人踏足在这个清朝皇帝曾经饮马的地方,有了“漠漠山河”的历史感慨与“歌翻敕勒”的旷达心境。又有《长春》之作“宽城马上有箏琶,一路平芜尽落花。回首长春宫外望,金驼朱鸟已无家。”宽城,长春旧称。连横所见的宽城落花景象,勾起了他对北京故宫长春宫的联想,只可惜此处长春美景依旧,却被日本势力盘踞。在这两首诗中,诗人古今内外思绪纵横,展现出了“使事用典”技巧和“史家意识”。

熊飞宇总结连横诗词中有“青山青史”的价值追求和“一箫一剑”的行为模式。^[71]诗人心境随外在雄浑景物而开阔,诗作也多了雄壮的气质,塞外的驼队、红柳、朔风、塞云、秋雪,苍茫意象已赛关内春色。连横把东北之旅定位为吊古与寻诗,他诗酒相伴,边走边游,诗性所至,时空之景皆揽入笔下。这成就了其“宋艳班香”“河黄塞紫”^[72]的优秀创作,也引得台湾友人黄欣发出“太史自称牛马走,伊人宛在鹭鸥居。江湖我亦扁舟侣,拟买青山共结庐”^[73]的钦羨。

四、结 语

离开东北之后,连横依然关注着命运多舛的黑土地。1931年,在致亲友的信函中,连横多次提及“满洲之事,汝在上海,阅报当能知之。”^[74]“东北之事,阅报当知,……中国现状,思之可痛,然汝既出门,又无内顾之忧,只好忍耐困苦,以待时机;……时局变化,未可预测,万一通讯杜绝,余与汝母均能自重,汝可免虑,汝之生命,则余之生命,汝之事业,则余之事业,前途远大,祖宗当降福于汝也。”^[75]他多次表达对东北局势的看法,以及对东北地方风俗民情的热爱。

王泰升在《日本统治下台湾人关于国籍的法律经验:以台湾与中国之间跨界的人口流动为中心》一文中曾指出,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刚刚开始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民对于文化身份的认同远远高于国籍认同。这使得“由国籍所表征之法律上的国民身分,与彼等情感上的文化或群体的认同并不一致”。^[76]日据台湾之后,大批台湾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对于血缘、家族与中华文化的高度依赖和认可。他们有的内渡,延续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经验,有的虽选择日本国籍,但致力于保存汉文化。像连横这样明确选择恢复国籍,认同中华民国,并倡导现代体制的传统文人少之又少。究其原因,除了连横自身深刻的思考与见识之外,东北经验或许也是促因之一。纵观其整个大陆之

行,连横在上海滞留时间最长,其次便是东北。在东北,连横了解了东北历史,目睹了日俄战争遗迹,参与报纸事业,开阔了国际视野,增进了现代观念与国家意识。连横为文抨击袁世凯违法窃国、关切政府选举体制变动,而且比之在上海、北京时期更加犀利、大胆。他曾因1913年袁世凯将“双十节”改为“大总统就职日”抹杀起义之功,而慨然论道“夫共和之国家,以国民为主体,大总统者国民之公仆尔;以公仆之就职,而抹杀国民之纪念,其意何居”,^[77]并作诗《癸丑十月十日》刺之。由此可见他对于现代国家体制的见解之深,以及对新生的民国的希望之厚。因此,连横东北之行对其思想、改籍的影响十分重大。连横一生经历清朝、日本殖民时期,以及民国时期,游历东北后,选择恢复中国国籍。身份的变化,影响了他的政论文章和诗文书写。对连横东北之行及其诗文创作的研究,有助于解读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台湾文人重返祖国后身份认同的改变。

注释:

- [1] 朱学琼《剑花诗研究》,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0年5月。
- [2] 黄美玲《连雅堂文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5月。
- [3] 林文月《青山青史——连雅堂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0月。
- [4] 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
- [5] 江宝钗《日治时期台湾传统文人对世务之肆应——以连横的汉学传播事业为观察核心》,《成功大学中文学报》(台南)第26期,2009年10月,第81-117页。
- [6] 林元辉《以连横为例析论集体记忆的形成、变迁与意义》,《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第31期,1998年9月,第1-56页。
- [7] 许雪姬《是勤王还是叛国——“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的一生及其认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57期,2007年9月,第57-117页。
- [8] 许雪姬《在“满洲国”的台湾人高等官:以大同学院的毕业生为例》,《台湾史研究》(台北)第19卷第3期,2012年9月1日,第95-150页。
- [9] 许雪姬《口述历史丛书79: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 [10] 清朝时期,“走番仔反”是汉人移民为躲避台湾当地少数民族出草猎头的一种防范、逃离行动。日本据台之后,“番仔”变为指称日本侵略者,“走番仔反”就是台湾人民内渡大陆逃难或起义抗日的意思。据曾迺硕记载,《马关条约》有对台人两年改籍之宽限的条款,连横不愿改籍,故极力设法归国学习或就业。参见曾迺硕:《台湾先贤先烈专辑·连横传》,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第31页。
- [11] 洪卜仁《厦门旧报寻踪》,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0页。据郑喜夫所编《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记载,1905年,“春、夏间,日俄酣战,先生愤清政不修,携眷赴厦门,创办福建日日新闻,鼓吹排满。”但1904年9月4日《鹭江报》第76册“闽桥近闻”栏的第一则消息《厦门:福建日日新闻出现》记载“连雅堂近邀同志在厦门太史巷创设福建日日新闻,每日出版一大张,全年报费五元,定于八月初一日(笔者注:9月10日)发行。其内容优美,外采飞扬,实为报界上之特色。连氏笔法杂横恣肆,著作如林,现未出报,而同业已成称贺。所谓不露文章□已,惊者请与阅报诸君共证之。”说明连横在1904年9月间,已在福建开始经营新闻事业。
- [12] 一说因清政府向驻厦日本领事馆抗议该报之排满立场,报纸遭到封禁,遂改组未果。见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第53页。
- [13] 1912年4月19日,连横致信在台好友魏清德,托其代领《台湾日日新报》社工资。
- [14] 谢介石(1879—1954),原名谢海,字介石,号幼安、又安,别号文侠、怡庵、怡鑫等,新竹县人。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毕业后至北京任张勋法律顾问。1914年,至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申请放弃日籍。1915年,加入中华民国国籍。1932年,担任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1935年5月,任伪满洲国第一任“驻日大使”。战后,以汉奸罪名被判刑,1948年获释,1954年去世。谢介石曾引介许多台湾人前往伪满洲国任职,使台湾与伪满洲国之间联系较为紧密。谢介石擅长汉诗,作品散见于《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诗报》《台湾诗醇》等。参见黄美娥撰、施懿林主编《全台诗》第30册,台南:台湾文学馆,2013年,第485页;张泉论文《台湾日据期精英的跨域流动与地方/世界的新视域——从新竹风云人物谢介石谈起》,新竹清华大学“竹塹风华再现:人文、艺术与地方的交响齐奏——第三届台湾竹塹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7年11月10-11日。
- [15] 王香禅(1886—?),名梦痴,本名罔市,号留仙,台北艋舺人。台北永乐座著名艺旦,后改嫁谢介石,婚后同赴上海,转居吉林、天津、北京等地。其诗作刊行于《台湾日日新报》《台湾诗荟》《台湾诗报》等报刊。参见智能型全台诗知识库,吴福助撰,网址: <http://xdcm.nmtl.gov.tw/twp/b/b02.htm>。

- [16] 林文月所著书中曾记载,连横与谢介石先是在上海碰面,但“在雅堂北上寻长城、西行访安庆之前,因幼安受聘为吉林法政学堂教习兼治报务的关系,先行离沪,北来吉林”。见林文月《青山青史——连雅堂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第115页。
- [17] 连横参与的《新吉林报》经多方查找,尚未找到,亦让本研究难以从第一手资料《新吉林报》入手进行研读,未能详细论述该报所刊载的连横政论文章和诗文。据前人研究,1911年,《新吉林报》在吉林中学堂创办,主笔诸克聪,顾问顾冰一,其宗旨是“发表政见,鼓吹舆论,促进完美共和政治”,宣传办教育、兴实业、行立宪、倡共和等反帝爱国民主思想。参见夏军主编《百年吉林——1907—2007》,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3页。关于其创办时间,亦有两种说法:一说创办于1910年9月28日(参见佟冬主编,栾凡、敬知本、田阳等著《中国东北史》第五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733页);一说创办于1911年12月,松毓、文耆、承志等在长春创办《新吉林报》,用以对抗鼓吹“保皇立宪”的官报《吉林日报》(参见程舒伟、赵文铎编著:《吉林省历史文化名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1页)。
- [18] 连横曾在《大陆游记》中表达对发展报业的重视“报纸为舆论之母,一国之消长系焉。”参见连横《雅堂先生余集·大陆游记》卷一,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16页。
- [19] [20] [56]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6页,第249页,第247页。
- [21] [24] [27] [28] [29] [30] [31] [49] [51] [55] [69] [70] [77] 连横《雅堂先生余集·大陆游记》卷二,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84页,第93页,第85页,第85页,第89页,第88页,第91页,第91—92页,第91页,第95页,第85页,第88页,第98页。
- [22] [35] [64] 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5页,第99页,第97页。
- [23] 谢介石在吉林期间,与张叔平、细野喜一、儿玉多一共同发起成立“中日国民协会”。参见《发起中日国民协会》,《盛京时报》第1953号,1913年5月16日,第7版,“吉林”栏。
- [25] 据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记载,王敬欣,金门人,贾于此。连横曾见之于上海,而其昆仲敬济、敬祥为神户巨商,连横旧友。参见第94页。
- [26] 林文月《青山青史——连雅堂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第113页。
- [32] 松毓(1863—1929),满族人,曾创办多项实业,用所得发展文化事业,如创办《公民日报》《新吉林报》《吉林日报》,以宣传新思想;创办女子学堂、毓文中学,为社会培养新人。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坚定革命,担任“奉天急进会”吉林分会会长,捐资支持北伐军北伐。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革命党后,他加入国民党,并为参议。参见孙青《清末吉林民主思想的实践者松毓》,房俐主编《档案吉林·省档案馆卷》(上卷),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第164—166页。据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介绍“满洲世家,而素主革新者。凡公益之事,知无不为,令誉夙著”,第96页。
- [33] 杨怡山,《新吉林报》报社社长,临时参议员。“锐意进取,以扶持民党,故官僚忌之。”参见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第96页。
- [34] 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第96页。1913年8月13日,吉林当局借口省立中学校的《新吉林报》为“乱党”的机关报,将该报查封(夏军主编《百年吉林——1907—2007》,第380页)。另记载:民国初年吉林报刊的主办者大多为原吉林同盟会员,他们都希望尽快改变东北因军阀混战所造成的落后状况,所以所办报刊常有激烈言语,因此引来东北地方当局的镇压,程度较清末更甚。如以“阐扬共和,指导舆论”为宗旨的吉林团体联合会创办的机关报《新吉林报》,在东北“下旗改历”后不久,因联合会被解散而随之停刊。参见佟银霞《衰落与重振:一个传统城市的变迁轨迹——以民国初期吉林市为中心的考察》,姜维东主编《东北亚研究论丛·七》,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6、197页。
- [36] 《寄居台湾侨民回国恢复福建原籍兼改名有关文书》转引自洪卜仁《连横的祖国情怀》,邓孔昭等主编《连横研究论文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1—342页。
- [37] 郑喜夫在《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中写道“夏,清史馆开于北京东华门内,馆长赵尔巽广延海内通儒,负任撰述。先生亦应聘为名誉协修(据陈彦侯先生遗稿),入馆供事”,第102页。
- [38] “据连横自述,十三岁时,父亲即以余文仪编撰之《台湾府志》授之,奠定他日后述作《台湾通史》的念头。《台湾通史》自收集资料、撰写至完成,费时十年,全书共卅六卷,架构分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书中大汉民族精神贯穿,他以著作明志并伺机待变。”参见黄美玲选注《连横集》,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年,第16页。
- [39] 倪仲俊《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通识研究集刊》(桃园)第4期,2003年12月,第141页。
- [40] 连横《大陆诗草·自序》,《连雅堂先生全集·剑花室诗集》,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5页。
- [41] 连横《连雅堂先生全集·剑花室诗集》,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13页。后文所引诗作,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剑花室诗集》,不再一一注明。
- [42] 连横有《妇病》《哭曾九皋》《吊曾九皋》《吊毓卿词兄》等诗作。
- [43] 未署名《拾碎锦囊(九十九)》,《台湾日日新闻》日刊,1905年11月11日,第3版,“诗话”栏。

- [44] [日]近卫笃磨日记刊行会《近卫笃磨日记》(第二卷),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第195页。
- [45] 连横《满洲最近外交史》(续),《鹭江报》1904年10月4日(光绪三十年八月廿五日),第79册。
- [46] 如连横在《鹭江报》的同事冯葆瑛分析认为“日本之于中国,同处亚洲,有唇齿辅车之谊。必不欲自撤藩篱以便俄人之犯。”见冯葆瑛《论日本归还满洲之主义》,《鹭江报》1904年6月8日,第67册,“论说”栏。
- [47] 蔡佩香,字梦兰,号南樵,台南人,安平县廩生,曾任《台南新报》记者。
- [48] 《连雅堂先生全集·雅堂先生集外集·台湾诗荃杂文钞》,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173页。
- [50] 雅堂《台南新报满洲之风云》,刊登于《选报》1903年9月2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第54期,“新论衡”栏。
- [52] 连横《雅堂先生余集·大陆游记》卷一,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26页。
- [53] 连雅棠《铁砧山记》,《台湾日日新报》1911年1月28日,第1版。
- [54] [63][65][67]朱学琼《剑花诗研究》,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0年,第191页,第72页,第47页,第240页。
- [57] 洪桂己《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第540页。
- [58] 孙风华《章太炎、连横民族文化思想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50页。
- [59] [62]这段跋语写于1925年1月15日《台湾诗荃》第13号上。参见《连雅堂先生全集·台湾诗荃》(下),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18页。
- [60]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书林主编《章太炎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5页。
- [61] 洪卜仁《厦门旧报寻踪》,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 [66] 连横《连雅堂先生全集·剑花室诗集》,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12页。
- [68] 此诗收于《连雅堂先生全集·剑花室诗集》,第7页。
- [71] 熊飞宇《“青山青史”和“一箫一剑”:连横词的疏解与赏析》,《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4月,第4期。
- [72] 赵钟麒对连横大陆之行诗歌的评价,见《连雅堂先生全集·剑花室诗集》,第7页。
- [73] 黄欣对连横大陆之行诗歌的评价,见《连雅堂先生全集·剑花室诗集》,第8页。
- [74] 连雅堂致夏甸信,1931年9月24日,《连雅堂先生全集·雅堂先生家书》,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13页。
- [75] 连雅堂致震东信,1931年9月27日,《连雅堂先生全集·雅堂先生家书》,第14页。
- [76] 王泰升《日本统治下台湾人关于国籍的法律经验:以台湾与中国之间跨界的人口流动为中心》,《台湾史研究》(台北)第20卷第3期,2013年,第57页。

(责任编辑: 陈小冲)

A Study of the Tour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Lian Heng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Yu, Hou Jingjing

Abstract: After Taiwan was ceded to Japan in 1895, Lian Heng published a number of political articles, such as “The Recent Diplomatic History of Manchuria” and “The Tainan New Newspaper’s Report on Manchuria”, focusing on the issue o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an Heng went to Northeast China for short-term work, participated in the editing work of “New Jilin Newspaper” and “Biansheng”, and wrote down many poems and articles about international time, northeast landscape, national hero, costume culture, etc. After that, those were compiled into two volumes, namely “The Continental Travel Notes” and “Continental Poetry”. These poems have modern ideas and are not limited to Chinese traditional rhyming form, in which the two contrasting styles of writing, “impressive and impassioned” and “gentle and delicate”, are deeply contained. In addition to this, every word is also full of Chinese national thought. What he saw and heard in Northeast China prompted Lian Heng to doubt the real motive behind Japan’s propaganda of “Asian Monroeism”. After the trip, he even chose to rejoin Chinese nationality and started writing “a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Lian Heng’s literary creation vividly reproduces taiwanese literati’s concern on the fate of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leaving many clues for today’s people to look at the clos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Lian Heng, Chinese national narrative, historical narrative, cultural practice